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成就和展望

贺圣达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云南 昆明)

摘要: 本文回顾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进展, 对中国学者在对中国古籍中有关东南亚史籍和史料的整理、翻译介绍国外东南亚史研究成果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作了简要论述; 本文最后分析了东南亚史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的差距, 提出了以后东南亚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东南亚史研究; 世界地区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是世界上对古代东南亚了解和记载最多的国家, 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 却是在进入 20 世纪后开始的, 30—40 年代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冯承钧、李长傅、向达、方国瑜、凌纯声、姚楠、张礼千、陈荆和、陈礼颂等, 已对东南亚史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中国—东南亚关系史、民族关系史、古代南海史地考证以及华侨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 当时研究的领域有限, 较少涉及东南亚国家本身的历史。

中国学者对东南亚史的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70 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 才得以从各个方面推进。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 除了个别学者(如陈序经先生)已大有建树, 总体上看, 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 还处于翻译国外著作(特别是 70 年代初翻译了一批东南亚各国史的著作)、编写简述东南亚国家历史的讲义、论述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以及对一些历史问题在内部进行研究(如 70 年代中叶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对中泰关系史、中越关系史的研究)。1978 年以后, 情况才发生大的变化, 北京、广东、福建、云南、河南等地东南亚研究机构的恢复、发展或新建, 北大、厦大、暨大、中大、郑大、云大和云南师范大学对东南亚教学的加强和硕士、博士研究生招收、培养工作的推进, 以及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和各地分会的积极活动, 有力地调动了各个方面的力量, 激发了学者的活力, 推动了东南亚史研究在各个层面的展开, 使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在 80 年代前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仅 1979 年至 1986 年间发表的论文就达 390 篇, 占这一时期有关东南亚论文总数的 38%^[1]), 而且深刻地影响了 20 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东南亚史研究(但 80 年代中叶起史学研究的论文就大为减少, 1998 年南方 5 个东南亚所 6 种刊物载文中, 历史类已下降到 6%)。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史研究, 似乎正处于这一波将逝而新的一波尚未涌起的时期。回顾过去我感到成就不凡, 认为东南亚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中国对世界各地史研究中最有成绩的领域之一。东南亚研究的机构之多, 东南亚史研究的范围之广、出版的成果之多, 都超过了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地区(如南亚、西亚、非洲、拉丁美洲)历史的研究, 对中国人全面了解乃至深入认识东南亚的历史, 促进双边的学术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的发展, 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也面临困境和问题, 不能不使人有所忧思; 在新世纪如何发展, 树立新的目标, 开创新的业绩, 更需要认真思考、探索, 作出新的艰苦努力。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研究的领域广泛，涉及了东南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大大超越了建国前对东南亚的研究主要限于移民、华侨和中国—东南亚关系和南海史地考证的较为狭隘的范围，也突破了1978年前以翻译外国译著、介绍其情况和重点研究华人华侨及某些重要问题的局限。在地域上涉及东南亚的十个国家，从时间上包括了从原始社会史到当代史，涉及东南亚原始社会史、古代国家史、西方殖民侵略和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史、殖民统治和殖民地社会变迁以及民族主义运动史、资产阶级改革、革命和二战后的历史发展；在研究中重视对东南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特点的探讨，对古代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古代印尼、菲律宾的土地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特点作了较深入的分析研究；重视东南亚史上的尤其是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对三次英缅战争、缅甸国王敏同和泰国朱拉隆功王的改革、越南维新运动、菲律宾独立运动、印尼蒂博尼哥罗起义、缅甸味龙会起义、越南义静苏维埃和1945年8月革命、泰国1932年革命、印尼九·三〇事件、越南抗法、抗美援朝，以及印尼的蒂博尼哥罗、苏加诺、哈达、苏哈托，菲律宾的黎萨尔、马科斯、科·阿基诺，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越南的陈仁宗、朱文安、黎圣宗、潘佩珠、潘周楨、吴庭艳、胡志明，泰国的朱拉隆功、瓦栖拉兀（拉玛六世）、比利、銮披汶、缅甸的敏同王、金蕴敏、德钦丹东、吴努、昂山，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等重要历史人物，都有专题性的研究；对在发展中国—东南亚关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如郑和、黄遵宪、薛福成、孙中山在南洋的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中国史籍中大量有关东南亚的文献进行整理；对中国—东南亚关系史和东南亚华人华侨史的研究，更是中国东南亚研究中富有特色、体现优势和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对东南亚文化史、宗教史、民族史、军事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这就使得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全面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且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以来，国内发表的有关东南亚史的论文不下900篇，出版的著作（包括论文集）超过300部。

二

我国古代对东南亚的记述是世界各国中最为丰富的，是研究古代东南亚史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料，世界上著名的东南亚史研究专家霍尔等都极为重视中文资料。因此，对之进行系统地整理，是东南亚史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和基本建设，也是中国学者能作出独特贡献的重要领域。建国以来，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出版了大量成果，主要有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1987），王邦维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华书局，1994）、章巽的《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1986）和郭鹏的《佛国记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向达的《蛮书校注》（中华，1958）和赵吕甫的《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1986）、木芹的《云南志补注》（云南美术，1995），江应梁的《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苏继庾的《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陆俊岭校注《异域志》（中华书局，1981）、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宋）赵汝适的《诸番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黎崱的《安南志略》、（明）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罗日的《咸宾录》、鞏珍的《西洋番国志》、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明）茅元仪编《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清人大汕的《海外记事》、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王之春的《清朝柔运记》、魏源的《海国图志》（陈华等点校注释，岳麓书社，1999）、梁廷枏的《海国四谈》等重要涉及东南亚的古籍，都有了高质量的校注本。

此外，郑鹤声、郑一钧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3）、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景振国主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老挝资料汇编》（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陈显泗等编的《中国古籍

中的柬埔寨史料》(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陆俊岭、周绍泉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柬埔寨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6)、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有关东南亚史料汇编》(云南人民, 1986)、黄国安等编的《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辑》(广西人民, 1988)、宁超主编的《滇国、滇越国、哀牢国、掸国、八百媳妇国史料汇编》(云南民族, 1996)等, 也都是很有价值的涉及东南亚史的专题或分国别的史料汇编。

除了上述大陆出版的大量涉及东南亚史的经整理、校注的古籍, 台、港、澳方面也有一些很值得重视的校点著作和资料汇编, 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明清史料·庚编》(中华书局, 1987年影印), 汇编了明清(主要是清)大内档案中有关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泰国、缅甸及其与中国关系的资料, 极具价值。清王大海的《海岛逸志》和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这两种对于了解清代东南亚尤其是海岛东南亚有重要价值的著作, 分别由香港学津书局和澳门文化司出版。

当然, 中国古籍中涉及周边国家地名极为复杂, 有的不加细察, 难免张冠李戴。尽管上述一些古籍整理者对所点校著作中的地名作了考证, 前辈学者岑仲勉、韩振华、朱杰勤、姚楠、方国瑜等以及海外尤其是日本和法国学者也作过不少研究, 但缺乏整理汇总。陈佳荣、谢方、陆峻岭三位先生, 在前人大量研究的基础上, 博参群书, 惨淡经营, 完成了《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 1986)一书, 不但广收中国史籍中记载的古地名, 加以考释, 而且将外国专著中的南海古地名转为汉译并予考释, 为中外东南亚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是一项极富学术应用价值的著作。

三

介绍翻译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有关东南亚历史的著述, 也是加强基础性工作、推进我国东南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80年代前, 我国学者翻译的东南亚史著作, 主要有陈礼颂翻译的英国人吴迪的《暹罗史》、姚楠翻译的英国学者哈威的《缅甸史》、陈炎先生翻译的缅甸学者波巴信的《缅甸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室集体翻译的苏联缅甸学者瓦西里耶夫的《缅甸史纲》、北大东语系集体翻译的越南著名学者陈辉燎的《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苏联史学家尼·烈勃里科娃的《泰国近代史纲》、《泰国现代史纲》、厦大外文系翻译的泰国著名史学家琼赛的《泰国和柬埔寨史》和《老挝史》、吴世璜译的印尼学者巴尼的《印度尼西亚史》、姚梓良翻译的温斯泰德的《马来亚史》、吴世昌翻译的菲律宾史学家F·赛义德的《菲律宾共和国》、林启森译的赛义德的又一部著作《菲律宾革命》等。

为更多地了解国外东南亚史研究的状况和新进展, 努力赶上东南亚研究的世界水平, 为东南亚研究界提供必要的国外参考资料, 20多年来尤其是在80年代我国东南亚研究者又译介了多部国外东南亚研究史著作, 其中主要有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英国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D·H·E, 霍尔著《东南亚史》(上、下册), 姚楠等译美国较有代表性的东南亚史著作有卡迪的《战后东南亚史》, 姚楠、马宁译卡迪著《东南亚历史发展》(上、下册), 姚楠编译著名的华裔学者王赓武先生的《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 戴可来译越南阮雅等著《黄沙和长沙特考》和潘耀黎著《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 梁红奋翻译的越南史学著作《雄王时代》和《越南村社》, 王文达翻译的泰国史学名著《庸那迦纪年》, 赵维扬、李孝骥等译缅甸貌貌博士著《缅甸政治与奈温将军》, 贺圣达译缅甸貌丁昂著《缅甸史》, 马宁、段立生译《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泰国当代文化名人披耶阿努曼拉查东的生平及其著作》, 李学民、陈巽华译印尼林天佑遗著《三宝瓏历史》和新加坡苏里亚迪纳达博士著《爪哇土生华人政治》, 李学民译印尼萨奇门著《蒂博尼哥罗战争史》, 刘永焯译法国默涅著《柬埔寨史》, 周南京、梁英明选译《近代亚洲史料选辑》,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东南亚历史译丛》(1—4辑)等。进入90年代后出版的重要译著有, 戴可来等翻译的越南陈重金著《越

南通史》、周南京翻译的澳大利亚史学家梅·加·李克莱弗斯的《印度尼西亚简史》等。贺圣达近年来主持翻译的《剑桥东南亚史》也将交付云南人民出版社。

四

东南亚地区史和东南亚国别史的研究和撰写，既是研究东南亚历史的重要基础和内容，也是体现我国对东南亚历史研究总体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全面了解东南亚地区及各国历史发展，认识东南亚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并进而深入研究东南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推出了二十多部东南亚地区史和国别史著作，改变了 70 年代之前那种很少有正式出版的中国人写的东南亚史的状况，而且，不少著作有厚重的份量和较高的学术水平。海天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包括了“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掸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南海古史初述”等八种，洋洋百余万言，以丰富的史料，对中国古籍中提到的数十个东南亚古国的民族源流、历史演变、文化发展及对外关系，作了较系统的疏理、论述，引证史料丰富，在撰写方法上别具一格，对许多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虽然还不是比较完整的东南亚通史或国别史，但以一人之力对东南亚史作如此广泛而又相当深入的研究并在 60 年代初就已完稿，在海内还是第一人。虽然 90 年代初才公开出版，但五六十年代已在香港印出赠予同行，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一批简明可读的东南亚简史和内容丰富、材料扎实、学术性较强的通史类著作。在简史方面有钱文宝、林伍光的《马来西亚简史》（商务，1981）、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著的《泰国简史》、《缅甸简史》、厦大南洋所编《新加坡简史》、厦大历史系编《印度尼西亚简史》、刘迪辉的《东南亚简史》等。

在通史类著作方面，有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泰国史》（广东人民，1987）、金应熙主编的《菲律宾史》（河南人民，1989）、陈显泗著《柬埔寨两千年史》（中州，1990）、申旭的《老挝史》（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0 年）、贺圣达的《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周南京整理的巴人遗著《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995）、郭振铎、张笑梅的《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这些著作的特点是资料尤其是中文资料较为丰富，内容较为详尽，重视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重视对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论述。这样，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有了中国人撰写的较为详尽的通史。此外，在东南亚地区史方面，有王民同主编的《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梁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五

如果说通史的编著撰写代表了中国学者研究东南亚地区史和国别史所达到的总体水平，那么，对东南亚史上重大问题的研究，则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的深度、取得的重大进展和一些方面的突破。其中一个重大的突破，是中国学者对南诏大理国的族属和泰族起源问题作了深入研究，确证了南诏、大理国非泰族所建，对把南诏—大理史说作为泰族史，把南诏—大理国说成是泰族建立的王国的错误说法，作了全面、科学、有充分说服力的分析和批判，澄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对于消除 100 多年前由拉古柏里等西方学者提出，后来又为泰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学界、教育界广泛接受的“泰族建南诏王国说”造成的影响，起了重要的学术作用。在这方面，杜玉亭、陈吕范在 1979 年《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和陈吕范的《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在泰国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但实际上早在 30—40 年代，我国学者凌纯声、方国瑜和海外学者许云樵就著文指出“泰族建南诏王国”说的谬误。新中国成立后，江应梁、马长寿等学者也著文论证了“南诏是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政权”。贺圣达的《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

与破产》(载《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1990.4;英文版,1995.4)则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了全面的回顾审视和综合分析。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扩展、深入到壮泰各族的渊源和历史联系。两部很有深度的著作是范宏贵的《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和文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和何平的《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察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东南亚不同于中国、印度,也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而且各国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学者深化对东南亚史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重视对东南亚历史发展特点的研究。上述在一些通史如柬埔寨史、缅甸史、越南史在论述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时,就充分注意到了探讨其历史发展的特点。有一些论文和著作,则专门探讨了某些问题,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及东南亚各国古代社会的特点。陈碧笙的《古代暹罗封建制初探》、邹启宇的《泰国的封建社会与萨迪纳制》和《泰国封建农奴制简论》、何肇发的《曼谷王朝初期的人力控制》深入分析了泰国的合土地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为一的“萨迪纳制”以及古代泰国社会着重于“人力控制”的特点;贺圣达的《阿赫木旦制与缅甸封建土制经济的特点》、《试论缅甸封建社会的特点》等文剖析了缅甸封建制的特点。申旭和蔡文枫、刘稚和金旭东、陈显泗和朱昌连等学者,则分别探讨了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何平在《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中,提出并论述了古代东南亚是一种“封建—奴隶制混合结构”的看法,否定了东南亚古代史上有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的说法。

在对于近代东南亚社会特点的研究方面,梁志明的《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是一部研究殖民主义统治对东南亚历史发展及东南亚近代社会特点的影响的专著,不但系统地阐述了殖民主义在东南亚发展的全过程,而且重点剖析了各主要殖民宗主国在东南亚各国的殖民政策及其特点,以及殖民主义因素对东南亚殖民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影响。

对于在西方殖民侵略时期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近代泰国,中国学者尤其重视对朱拉隆功改革和泰国1932年革命的研究,揭示近代泰国改良主义道路发展和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贺圣达发表了《关于朱拉隆功改革的指导思想》、《泰国传统社会与朱拉隆功改革的局限性》、《朱拉隆功改革成功的内在原因》及《朱拉隆功改革与泰国的现代化进程》等文,对朱拉隆功改革作了较全面的评述。刘玉遵的《试论泰国1932年政变》、张映秋的《试论泰国1932年“六·二四”政变》、陈碧笙的《关于暹罗1932年政变的若干问题》以及陈健民的《论1932年泰国资产阶级革命》等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场政变——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性质、作用、意义、影响等。张映秋的《评披汶政府的十二个通告》则对銮披汶政府在30年代提倡泰民族主义、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观念和道德秩序,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批判了其“唯泰主义”。

较为系统论及战后东南亚历史及政治、经济发展特点的,有贺圣达的《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张锡镇的《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汪新生的《现代东南亚政治与外交》(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和徐建国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探讨各国发展特点的,有马志刚的《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时事出版社,1996)、陈晓律的《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古小松的《越南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95)和赵和曼的《越南经济的发展》等。王亚毅的《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则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战后东南亚的发展的特点。

六

东南亚发展特殊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东南亚文明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不同于世界

上的其他地区。本世纪七十年代前，由于对东南亚当地的古代文明知之不多，流行的是把东南亚视为“大印度”或“印度化国家”的观点；六七十年代后，由于泰国、越南大量的考古新发现，又有人把东南亚视为“东亚古代文化中心”，甚至认为稻作业、动物驯养、青铜器等都“起源于东南亚”。中国学者对这些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童恩正在其《近二十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略论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地位》等文中（均载《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提出，对上述外国学者的观点应“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他深入探讨了东南亚早期文明与中国南部早期农业文明以及百越民族南下的关系等问题，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中国长江以南，东南亚早期文明中的许多因素，也同越人文化及越人南下有联系。梁志明的《古代东南亚印度化问题刍议》（北大《东南亚南亚评论》第四辑），对“印度化”这一概念的含义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在肯定印度文化对古代东南亚影响的同时，强调东南亚自身的文化特征。其他也有一些文章，论及东南亚古代文明和印度化问题。但是，中国学者对东南亚古代文明和早期文化的研究总的来说还极为薄弱。

在对东南亚文化史的研究方面，贺圣达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是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宋立道的《神圣与世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出版）分别论述了南传佛教国家宗教（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和南传上座部佛教发展的历史。常任侠的《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上海美术，1980），是第一部论述东南亚美术的简史。梁立基、李谋主编的《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用不少篇幅论述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东南亚文化、文学的影响。陈玉龙等的《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在“汉文化”的大构架下，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中越文化交流。黄心川主编的《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越南卷》，则收录了于向东等人撰写的越南史上17位著名哲学家的评传，也是国内对越南哲学家和哲学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东南亚伊斯兰教、基督教的研究，虽有一些论文，尚无专著出版。此外，对于中国文学对东南亚文学的影响，已有多种（篇）论著，缅甸、泰国的文学史也已出版。但是，总的来看，对东南亚文化史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空白之处甚多。

七

对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是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很有特点、最能发挥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不仅兼得天时、地理、人和，而且源远流长，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老一辈的学者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许多成果都在这方面，如冯承钧先生的《中国南洋交通史》、李长傅的《中国殖民（移民）史》、方国瑜先生关于古代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的许多论文、吴晗先生的《16世纪之前的中国与南洋》、邵循正先生的《中法越南关系史》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在更广泛的领域、更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韩振华先生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收录了多篇深度研究的论文，对汉代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的考证尤见功力；朱杰勤先生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也有多篇专论中国东南亚关系史。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收录了多位名家撰写的有关中国与泰国、缅甸、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文化交流的长篇文章，合起来就是一部颇为详尽的《中国—东南亚文化交流史》；王介南的《中国东南亚文化交流志》，是一部工具书性质的记述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往的专著。论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史的专著有黄铮的《胡志明与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86）、黄国安的《中越关系史简编》、葛治伦的《中泰关系史》、余定邦的《中缅关系史》、王介南的《中缅友好关系两千年》等；专论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有余定邦、喻常森的《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山大学，1999）、聂德宁的《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研究》（厦门大学，2001）、高伟农的《走向近世的中国

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教, 1993)。中国西南在中国对东南亚(以及南亚)关系史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申旭的《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云南美术, 1994)和尤中《中国历代王朝通过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印半岛各地的交往关系》、《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0), 是这方面的两篇力作。

郑和下西洋是古代中国东南亚关系史上的辉煌篇章, 已有大批论文发表在郑和研究会编的学术刊物《郑和研究》和多种纪念郑和下西洋的论文集中, 较为全面的专著是郑一钧的《论郑和下西洋》(海洋, 1985), 而较为特殊的一部专著, 是孔远志的《郑和与印尼》, 系用印尼文撰写, 1993年在雅加达出版。此外, 陈炎的《海上丝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大, 1990), 以海上丝路为主, 兼论西南丝路, 重在探讨中国与东南亚尤其是中缅、中泰文化、经济交流。《瀛海币流》(云南民族, 1998)和《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四川人民, 1994)两书, 收录多篇论文探讨东南亚钱币与中国古代钱币的关系, 在中国—东南亚关系史研究中可算是别具一格。

八

东南亚华人华侨史, 就历史上华人华侨与祖国的关系而言, 可视为中国同东南亚关系史的一部分; 而就华人华侨在当地社会的成长、发展而言, 又是东南亚史的一部分。东南亚是华人华侨人数最多、最集中、历史最为悠久、与中国本土关系最为密切的地区, 东南亚华人华侨史当然也就成了中国东南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且, 中国学者研究华人华侨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30年来, 海外华人华侨群体的崛起及其同中国关系的密切, 更引起国内外关注。华人华侨史研究已成为东南亚史研究中的热点, 是二十多年来东南亚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 广泛涉及华人华侨在东南亚的历史、活动、华族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及对各国经济、文化的贡献、华人华侨与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尤其是与近代史上重大事件和伟人的关系(如华人华侨与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抗日战争等)、杰出的华人华侨历史人物、华侨华人华族因素对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影响等。在通史类著作方面, 有吴凤斌的《东南亚华族通史》(福建人民, 1994)和朱杰勤的《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 1990)以及李学民、黄昆章的《印尼华侨史》、黄滋生、何思兵的《菲律宾华侨史》和林运辉、张应龙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均由广东高教社出版)等。论述华族社会发展变化的专著有黄枝连的《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上海社会科学, 1992)、梁志明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昆仑, 2001)和曹云华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中国华侨, 1999)。经济史方面的有郭梁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史》(经济科学, 1998)等, 而全面、综合研究华侨华人(以东南亚为主)与中国关系的最新成果, 有庄国土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教, 2001)。

近年华人华侨史研究的一个特点, 是许多作者都深入当地进行实地的考察调研, 同时, 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也多有创新, 不同于80年代前多以介绍为主。上述庄著可以说是一个代表, 而对华侨华人经济文化及其同当地社会、民族关系的较为深入研究的专著, 有高伟农的《东南亚华人信仰诸神考》(曼谷, 2001)、曹云华的《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社科, 2001)、段立生的《泰国的中式寺庙》(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丛书)等。

九

展望21世纪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前景, 我认为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东南亚史研究面临严峻的挑战, 只有正视现实、正视挑战, 作出有力的回应, 采取相应的措施, 才能在新世纪开创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新气象、新局面。

中国东南亚史研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

一、作为历史学科的一部分, 东南亚史面临中国史学共同面临的问题, 即失去了80年

代初的光彩和吸引力，与正在迅速崛起的东南亚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研究相比，其处境冷落尤为明显。在东南亚专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历史类文章，已从 80 年代初的 35% 以上，降到目前的 5%—6%。培养出来的史学专业人才，毕业后很少专门从事史学研究。

二、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掀起的东南亚史研究潮第一波看来已经过去，第二波尚未形成；第二波的困难不仅在于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宏观的社会氛围，还在于人才资源。第一波的主要人才资源是解放前就开始东南亚研究史的老一辈学者、建国后十多年中培养的人才和恢复大学招生后 80 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这批人才中的前两类大多在 60 岁以上，后一类已在 50 岁上下；新一波的主力应是 80 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更为年轻、有更高的学历结构和国内外学术经历的人才，但这批人才中专门致力于历史研究的相当少，如果继续目前的情况，恐难以形成一支足以掀起“第二波”，创造 21 世纪初中国东南亚史研究新辉煌的力量。

三、中国东南亚史研究领域近二十多年来远较过去广泛，成果不少，但真正高质量高水平的并不多（尤其是在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史、华侨史及古籍整理之外的领域），对许多重要领域缺乏深入研究，甚至还有不少空白。由中国学者编著的东南亚国别史尚未出齐，即使已出版的也并非水平都已很高了；我们也还没有推出高质量的东南亚通史和中国—东南亚关系史；我们对东南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都相当薄弱，很少有这方面的专门史；有关东南亚的历史人物传记出了不少，但真正学术性强、有份量、有深度的极少。在宏观研究上，我们对东南亚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东南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和外来影响、东南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东南亚这个地球上的“东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何以大有异于地中海地区、东南亚的现代化进程等，都还很少甚至没有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微观上，做到很深很细而又“以小见大”的研究也很少。

四、中国东南亚史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对整个东南亚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研究上，国外对东南亚史的撰写，从赛代斯的《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1948）到霍尔的《东南亚史》（1955 年初版，此后几次修订再版）再到《剑桥东南亚史》（1992 年版）实现了两个大的飞跃；80 年代以来，新出版的各国史也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在对重大问题、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国外也取得了巨大进展，如澳大利亚史学家安东尼·雷德的《商业时代的东南亚，1450—1680》，深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和启发，被誉为研究前殖民时代东南亚“全面的历史”的一部巨著（全书两卷，共 665 页）和典范。而我们尽管有了许多论郑和下西洋的论著，有可能却未能对诸如“郑和时代的东南亚”写出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大作。此外，国外东南亚史研究在方法论上趋于多样化，许多史学家有意识地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而一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则重视历史时期的东南亚相关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成功，甚至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的名著《尼加拉：19 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和《文化的解释》（都已有中译本）的主要历史—文化资料就取自印尼的爪哇和巴厘，但其解释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人类学的，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深度融合，从而使这些著作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

五、在学术人才的培养上，尽管有多所大学已建立了与东南亚专业有关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但史学人才的培养仍是一个薄弱环节，青黄不接的现象已相当突出，适应 21 世纪东南亚史研究需要的高素质的人才（懂得对象国语言文字又熟悉掌握一门大语种外语，在古汉语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熟练国内外东南亚史研究状况，在某一方面有深入研究，学术视野开阔，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匮乏，一些东南亚古文字如喃字甚至已鲜有年轻学者掌握；一些素质较高的人才，转向了东南亚经济、国际关系、华人华侨研究等现实性应用性更强的研究领域。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20 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已使中国东南亚史研究在许多方面都

有了一个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好的、更为广泛的学术基础，这是向新世纪更高的目标攀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发展，以及中国与东盟将在十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都将极大地促进双边的各个领域的交往，增强双边人民互相了解的需要，增强中国更多更深入地了解东南亚的需要，从而给予东南亚史研究最强大的现实动力。为推进 21 世纪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笔者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从学术上高度重视东南亚历史研究在东南亚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把对东南亚历史的认识作为研究东南亚其他问题的必要和重要基础；把东南亚历史课程作为东南亚专业硕士、博士生课程以及一些大学本科尤其是开设硕士生课程的大学历史系本科课程，并相应地确定或组织专家撰写高质量的东南亚通史和国别史基本教材或参考教材。这些教材同时也是可以面向社会的东南亚史读物（由于这方面的基本读物的缺乏和基本知识的不够普及，在近年来大量出版的东南亚旅游类读物中，涉及历史的内容甚至重要人物的译名，都出现了大量不能容忍的错误和混乱，中国水电出版社出版的《异域风情丛书·东南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二、以 21 世纪学术研究的高标准，培养和提高东南亚史研究工作者：从事东南亚史的研究人员尤其是高级研究人员，除了具备和不断提高作为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素养，包括大语种外语的素养，还应努力学习、掌握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深入了解和及时掌握相关领域国外研究的先进成果和学术前沿，多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往。

三、在继续重视发挥优势、深化华人华侨史和中国—东南亚关系史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东南亚本身历史的研究，在相关的问题上有中国史学家的声音、观点和影响；针对中国东南亚史研究中存在的理论构架薄弱、分析缺乏深度、方法较为陈旧、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综合研究欠缺以及微观上深入、具体的研究少等问题，应强化宏观、深化微观，化力气做好具有开创性、前沿性的重大课题研究，重视史学理论的新发展，重视历史学研究同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结合，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有大的创新。

四、服务国内，面向东南亚，面向世界：东南亚史研究在新世纪能否兴盛，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能否很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服务于中国人认识、了解东南亚历史的需要。中国有 13 亿人口，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人对了解一些东南亚史感兴趣，这个需求量就够大了。同时，既然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东南亚，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成果也应该面向东南亚，面向世界，让他们了解中国学者的成果，与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自从二战中产生了“东南亚”这个词汇，战后开始对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以来，无论在东南亚还是在国际东南亚学界，占主导的东南亚史观还是西方学者著作的东南亚史观，是赛代斯、霍尔的东南亚史观，“剑桥东南亚史”的东南亚史观。西方学者当然很有贡献，而且在东南亚史研究的许多方面确实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学者的成果也应该走向东南亚，走向世界。这显然需要我们作更多的更艰巨的努力，包括提高研究人员的学术和外语水平，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出版外语版的或双语版的学术刊物、学术著作。当然，随着中国在 21 世纪的发展和中外友好关系的增进，也会有越来越多国外学者学习和掌握中文，直接阅读中文的论著。无论是服务国内还是面向世界，最重要的在于我们的东南亚史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质量。我们应该改进学风和文风，增强科学精神，树立精品意识，奉献更多的上品、精品。

参考文献：

[1] 刘永焯，中国 SEA 研究的回顾与前瞻[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Achievements and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Researches o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He Sheng-da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Kunming, Yunnan, 650034,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reviews all-sided the process of Chinese researches o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the last 20 years, expounds its main achievements, analyzes its short compared with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s, points out its radical poles and functions in researches on Southeast Asia, in order to promote it to service for the country, the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better.

Key words: Chinese researches o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chievements; perspectives

收稿日期: 2003-06-11

作者简介: 贺圣达(19-), 男(汉族), 云南昆明人, 云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 晓斌)